

【中共党史研究】

# 从新民学会的演化看中国共产党的筹创

——以毛泽东的首部编辑作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为中心的考察

胡为雄

**【摘要】**作为新民学会的核心领导人物,毛泽东为了引导、团结会员,方便会员交流思想、活动、学习情况,编辑完成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这是他的首部编辑作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新民学会的演化历程:从“改良人心风俗”到“改造社会”,从“共同的精神”到“主义的结合”,最终发展到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俄式革命道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把作为“建党先声”的新民学会两年多的活动,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材料。

**【关键词】**毛泽东;蔡林彬;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作者简介】**胡为雄,男,湖北通城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91)。

**【原文出处】**《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沪),2024.7.37~52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是新民学会干事毛泽东为了引导、团结会员,方便会员交流思想、活动、学习情况,有意识地收集会员通信后编辑而成的。收入其中的信件始于1918年6月,终于1921年1月。现在所见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有三集,除了启事、序言等之外,共收录会员通信50封,其中第一集有13封,第二集有30封,第三集有7封,而与毛泽东有关的达38封之多。第一集与第二集于1920年末出版,第三集于1921年1月出版,每集均印制了百册左右。《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对新民学会会员增进团结互助、共同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起到了精神引领作用。特别是第三集,记录了新民学会开始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组织转型的历史过程。《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把作为“建党先声”的新民学会这一重要团体两年多的活动,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为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材料。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是毛泽东创造性工作的结晶。他编辑这部通信集时,只收集会员通信,不收集任何学术论文、评论或新闻,其间也没有其他人协助。对于这项工作,他的态度是相当认真、严谨、细致的。他在绝大多数书信的题目下标出要点,让人直观了解书信的内容主旨。此外,他还给部分书信写了按语,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部作品,学界曾把它作为期刊来介绍,这是不正确的。这部通信集具有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的性质。其一,这部通信集是学会内部出版物,不像期刊那样在文化市场上销售;它不外传,印数很少,只供会员交流或供有兴趣且有人可能会者阅读。其二,毛泽东见学会内部没有讨论机关,于是提倡会员在分散各地后以通信方式向干事告知思想、工作与生活等方面情况,以推动团结互助、共同发展,进而编辑了此部通信集。所以,这部通信集具有会内文件的性质。其三,毛泽东在绝大多数信件标题下标

出要点加以提示,这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会员阅读,更体现了他作为编辑者引导学会发展的意图,使这部通信集起到了精神指导的作用。其四,毛泽东在每一集的最前面增写了启事、序言等内容,以编者身份说明了新民学会出版会员通信集的要求和目的,使通信集更加系统,成为一部较完整的作品。显然,这部通信集的性质与期刊完全不同。

倘若没有毛泽东的深入思考、精心谋划、全面收集和细致编辑,新民学会的这些书信肯定早就不复存在了。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珍藏了当年毛泽东寄送给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并于196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40周年之际将之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后人也很难看到这一珍贵文献。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展现了新民学会组织性质的变化和会员思想的变化。1918年春创立的新民学会,一开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sup>[1]3</sup>但在五四运动后,学会迅速成长为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团体。它关注世界形势特别是俄国革命的情况,立足于中国,投身湖南“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不断提升组织宣传能力,向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组织转型,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对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学界并未予以充分关注与讨论。本文拟对其作初步研究,对其三集内容分别作简要分析,梳理新民学会的演化历程。

### 一、从“改良人心风俗”到“改造社会”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共收录书信13封,其中毛泽东与会友的通信有10封。最早的一封是蔡林彬<sup>①</sup>于1918年6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最晚的一封是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6日写给罗荣熙<sup>②</sup>的。毛泽东与会友间的通信之所以多达10封,是因为他作为干事提倡会友要向他写信以互通消息。

第一集的最前面,有毛泽东起草的《出版〈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启事》云:“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信集》与《会务报告》。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sup>[1]42</sup>

这就把编辑出版通信集的目的说清楚了。《启事》最后嘱“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落款是“新民学会启”。<sup>[1]42</sup>这表明,新民学会的重要创始人蔡林彬、总干事萧子昇赴法国勤工俭学后,作为干事的毛泽东在学会中起到了骨干作用。他不仅是新民学会在湖南长沙的基地的实际负责人,更是学会的精神领袖,并且是会员通信的收集者和编辑者。

《发刊的意思及条例》进一步说明了出版通信集的目的:“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旧信,然于学会颇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展的。留法运动一事此集只能载蔡君给各会友的信,各会友给蔡君的信,其重要者尚望蔡君付来选印。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约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绝对公开态度,但不宜标榜,故通信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论会友非会友,都要纳一点印刷费。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好极了。”<sup>[1]42-43</sup>

第一集中的第一封信是蔡林彬写给毛泽东的,毛泽东标出的要点是“出处问题”,即会友如何进一步发展、“储养练习”。<sup>[1]44</sup>蔡林彬给陈绍休、萧子暉、萧子昇、毛泽东的信的要点是“京保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sup>[1]46</sup>蔡林彬给毛泽东的另两封信的要点分别是“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和“手段与目的”。<sup>[1]56,57</sup>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的要点是“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自修大学”。<sup>[1]62</sup>这样的编辑方式颇具匠心,与当下在学术文章标题下列出摘要、关键词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集中的13封书信,把新民学会会员从1918年6月至1920年11月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展示出来了。而毛泽东在编辑这些书信时,并未按通信时间的顺序排列。这时的新民学会会员,对如何发展学会和自身进行探索,围绕“储养”和“练习”,提出了各

种可能的方略。

蔡林彬因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先行到达北京后,于1918年6月30日致信毛泽东。其主要内容是:1.考虑和毛泽东等人入北京大学进一步深造。蔡林彬告知毛泽东已将其情况向恩师杨昌济“详切言之”,并称“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sup>[1]432</sup>力求“储养”与“练习”并得。这里的“储养”即学习积累知识,“练习”即从事社会实践。蔡林彬写道:“吾人今兹之所急者:一方要有适当之储养,一方要有适当之练习;得同时行之者,上也;一先一后者,次也;终于一才者,下也。”<sup>[1]43</sup>蔡林彬的这封信表明,他与毛泽东等人对于怎样“储养”、如何“练习”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方向。

7月,蔡林彬给萧子昇写信<sup>③</sup>,主要讨论“会友进取及同志互相协助的问题”,立意颇高:“窃意吾会须八表同营,以一人之忧共诸天下,以天下之忧纳诸一身。其入手办法,则自会友相互间为始。诸自有志以上,即当忠为之谋,解其一人内顾之忧力智力,以利用于共同大目的之上,夫然后天下事始可为也。”<sup>[1]45</sup>

7月底,蔡林彬在给陈绍休、萧子璋、萧子昇、毛泽东的信中,重点谈了北京、保定“留法预备班的创设及新民学会的大计”。<sup>[1]46</sup>赴法需要资金支持,筹款是个大问题。蔡林彬在信中说:“润兄七月二十六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sup>[1]49</sup>此信显示,他对新民学会的期望值很高:“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点。”<sup>[1]51</sup>他表示,毛泽东等人“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体,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sup>[1]52,53</sup>

7月24日蔡林彬致信毛泽东,话题主要是“大规模的自由研究”。他说:“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

吾之心,慰吾之情,虽不详说,差能了解。”“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与茅原华三[山](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暂以为近人近事而假借之<sup>④</sup>)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sup>[1]56-57</sup>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此时蔡林彬对俄国革命和列宁的情况了解不多,但他确实想“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冲决世界之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地位、事功。

在给毛泽东的另一封信中,蔡林彬围绕善恶的相互关系,谈论了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他写道:“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枉尺直枉[寻],弟实主张。”他认为:“善恶俱进,无甚轩轻。”“从全体之利害计算,可以杀身成仁,况不可行伪恶以得权乎(兄以时未至为言,我以为此正其时,此时稍为一枉,其所直不知几万也)。”“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虽于兄意未有当,亦聊以通其狂感耳。”<sup>[1]57,58</sup>蔡林彬改造社会的愿望十分迫切,提出不惜以伪恶的面目出现去铲除恶势力,以求最终得到善的结果。从这里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俄国革命中列宁的策略对他的影响。

蔡林彬在给邹彝鼎、陈绍休写信时,只谈及留法勤工俭学问题。他的枉尺直寻的想法,只告知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并不认同蔡林彬的主张,这可以从1920年2月他在北京给陶毅写的书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讨论了如何发展新民学会、如何改造社会以及女子留俄勤工勤学等问题。

毛泽东说:“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个

人虽有一种计划,象‘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sup>[1]59、60</sup>他接着谈的另一个大问题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提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sup>[1]60</sup>

毛泽东认为:“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日学会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济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所有的同志都“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sup>[1]61</sup>

毛泽东到北京是为了开展“驱张”运动。他告知陶毅,自己“在湘事平了”后会回长沙,“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sup>[1]61</sup>此外,毛泽东还提及:“今日到女子工读团,稻田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sup>[1]62</sup>

毛泽东的这封信表明,他当时对于如何发展新民学会、如何改造社会,还未形成较系统的理念,仍然以求学储能为首要任务,也还未放弃工读互助。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围绕求学谈了三个问题,即“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自修大学”。他说:“‘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sup>[1]63</sup>毛泽东提到自己暂不出国而在国内研究各

种学问,并列出了几种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sup>[1]63-64</sup>可见,毛泽东明白了解国情、研究中国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更明白必须在比较中认识中西文明这“两流”。同时,他还写道:“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sup>[1]64</sup>

接着,毛泽东就“团体”和“行”的关系表达了意见。他说:“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要“结合同志”,“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而这基础事业的基地就在长沙。他进而提出:“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sup>[1]64-65</sup>

最后,毛泽东说自己“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他还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sup>[1]65</sup>显然,毛泽东这时已很关注俄

国革命,想实地考察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形。

第一集还有罗学瓚写的两封信。第一封是罗学瓚1919年11月14日写给毛泽东、蔡林彬和萧子暉的。他在信中谈了“法兰西留学之乐”：“此地的同学,多规规矩矩勤勤恳恳的读书”;“有与共学之人,在此互相劝勉,时有受益,有疑问亦可询问”;“又成立有留法学生会,内分杂志部,演讲部,踢球部,雄辩会,现出有学生会务报告(敦请旅法名人,或同学中有学识者,演讲科学时事及各人心得及各省中外情状在杂志上发布)”。接着,罗学瓚还提及,如果具备“技能,法语,工旨”这三项条件,勤工俭学“可图大发展”。<sup>[1]67,68</sup>

同日,罗学瓚给毛泽东单写一信,专谈学问。他先是关心《湘江评论》是否继续出刊,再是劝毛泽东“此刻宜出洋求学”。他写道:“昨有一同学向我说,中国百年之内无大学问家出。我问其故。他说:中国之人用功于文字学太多,以研究科学之时光,多消磨于研究文学,故无学问家之根柢。譬如柏格森为大哲学家,彼并非专于哲学已也,他又精于数学,有数学博士之资格。又长于物理文学,及他诸科学,亦都可与各科博士相比伦。根柢甚好,故能成其为大哲学家。中国学者谁有此种根柢?又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以为求至国人之不如我,即已足(有此思想,恐怕还少),谁有志愿想伸足世界学者之林,而求有大影响于世界如杜威柏格森其人乎?”<sup>[1]69-70</sup>对这封信,毛泽东总结的要点是:“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sup>[1]69</sup>这表明毛泽东极为尊重科学功底好的哲学家,并立志成为大学问家。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罗学瓚的信中说:“兄此信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sup>[1]71</sup>

从这13封信来看,此时的新民学会会员都在积极作为,相当多的会友留法勤工俭学,还有不少人去往南洋。毛泽东则“顿湘两年”,使长沙成为会友活动的中心。此时的蔡林彬与毛泽东深入思考如何改

造世界,二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有些不一致。在不断的交流对话中,他们引领着学会的发展。

## 二、从“共同的精神”到“主义的结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共收录书信30封,起讫时间为1919年12月至1920年11月。该集最前面除了启事外,还有一个序言。序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第二集收录的重要书信及其主旨,相当于导读。毛泽东同样在书信标题下标出了要点。第二集中,他与会友的通信多达21封。在这些通信中,毛泽东除了谈留法勤工俭学及南洋方面的情况之外,还开始谈“主义的结合”,这是一种新的探求。

第二集的首封通信,是萧子暉于1920年3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他问及毛泽东到京开展“驱张”运动的情况、杨昌济的病情,介绍了蔡林彬等人在法国求学、作工的情况,并说自己想“牺牲勤工俭学主义,设法俭学。又想跳出法国,长驱入俄”。<sup>[1]74</sup>

1920年6月2日,向警予写信给彭璜、毛泽东,转告了蔡林彬对毛泽东的建议:“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此意我极赞成。”<sup>[1]75</sup>这封信也表明蔡林彬改变了过去那种枉尺直寻的想法。毛泽东于11月25日回信向警予,在谈湖南问题时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一年以来“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sup>⑤</sup>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他眼见湖南自治的主张无望实现,于是同意蔡林彬的建议,寄希望于教育,以从长计议:“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决计。”<sup>[1]75-76</sup>

接下来收录的三封信为:蔡林彬给萧子暉、彭璜

的信,主要谈在法国里昂组织绣业公司问题:萧子昇给周世钊的信,主要是告知到法国后可作铁工,“各种工作惟此为远大切实也”;<sup>[1]78</sup>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主要谈女子发展计划。

之后比较重要的信是1920年5月22日新入会不久的欧阳泽于赴法途中写给毛泽东、彭璜等人的。欧阳泽对新民学会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学会会员应有共同的精神,吸收会员时不分省界。共同的精神有四项:1.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地栽培它,务使它充量地发展。却不要一味地服从它、倚靠它,更不要利用它。2.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都要负完全的责任。3.会员对于会员,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4.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只有理性的爱,方能维持一个团体。<sup>[1]83</sup>关于吸收会员时要不要分省界的问题,欧阳泽在北京时曾与毛泽东等人“作非正式的讨论”。欧阳泽指出:“毛君曾说,暂时不必加入外省的会员,他的理由大概是:外省的会员,恐怕对于本会底内容和精神,不能明晰的彻底的了解,因此对于本会没有许多益处。这话是错了。”欧阳泽认为,无论本省或外省的人要加入学会,“必定是本会会员和他有长期间的周旋,对于他有精密的考察,实在见得他对于本会已经了解,并有很诚恳的表示”。他在信中还提及了上海半淞园会议确定的会员入会的手续:“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sup>[1]84</sup>

11月25日,毛泽东在去萍乡的旅途中复信欧阳泽。他表示:“共同的精神四项,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半淞园会议,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sup>[1]84,85</sup>欧阳泽在信中提到的评议部,

相当于组织部,而毛泽东就是评议员。发展会员时,他极注意入会者是否具有“共同的精神”。两人的通信表明,新民学会的组织已趋严密,发展会员时注重人品、道义和“共同的精神”。此外还可看到,毛泽东此时已放眼全世界。

1920年6月30日易礼容在武昌给毛泽东、彭璜写信,该信的要点是“做事要有准备”。易礼容说:“几早[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说‘实行政治运动,还要靠热心的政治家……’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我觉得你们这次的主张,若是不能实现,则并非理想之罪,只怪得先无充分预备。”“你们的‘同志’太少”,“你们的意见书上所说的一些事,你们到底叫谁去做?”如果“较先有预备,取‘分工作用’,能实行贯彻你们的主张,那好处就更多了”。“我觉得你们急急要回到湖南去,采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sup>[1]90,91</sup>

在编辑第二集时,毛泽东写了一段话作为按语,附在易礼容的信后。毛泽东说:“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sup>[1]91</sup>“‘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

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sup>[1]92</sup>

这段按语,把新民学会参加现实政治运动和实现长远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并初步说明了改造社会之计划,而实现计划的组织基础是“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由此可见,第二集反映了新民学会在参加湖南社会政治活动、纯洁组织的基础上,开始朝组织共产党的方向前进。此外,毛泽东还专门强调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这有除旧开新、同旧社会彻底决裂的意思。

1920年7月25日罗璈阶<sup>⑥</sup>给毛泽东的信,谈到了湖南问题、对于学会的希望、个人求学问题以及湖南教育问题。罗璈阶表示,“很赞成”毛泽东“注意一省的事业,想将湖南办好”,提出“零碎解决,本来是很切实的入手处,于此,我只祝你成功”。罗璈阶很关心新民学会的发展:“现在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知识界没有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因之没有舆论,没有是非。青年学生,浮沉人海,随俗靡化,这便是国病。我希望我们的学会,竭力反抗这一点,便不怕没有成绩了。”他询问了《会务报告》的内容和《湘江评论》出版情况,以及毛泽东的任教情况,并建议其“多挪出些自修时间”。他还问及毛泽东的英文学习情况,并说自己出国的事“还须延展”。他最后问道:“我省教育界情形,想有大改造,大建设。但是关于学款,可有了把握没有?关于人才,新到了些好名角没有?”<sup>[1]94-96</sup>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时罗璈阶与毛泽东意气相投,所谈问题都很切要。

11月25日,毛泽东回信罗璈阶,对相关问题一一作复。

关于湖南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

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sup>[1]96-97</sup>

关于新民学会的发展,毛泽东强调“主义的结合”。他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sup>[1]97</sup>

关于学会会务,毛泽东表示:“‘会务报告’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足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他嘱罗璈阶如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都检出寄给他。同时,毛泽东亦告知他《湘江评论》尚未重新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关于自学,毛泽东说自己“本期在城南附小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很少”。<sup>[1]97</sup>

最后谈到了教育问题,毛泽东颇为激愤:“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sup>[1]98</sup>

这封复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学会是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的结合”,在政治实践上强调要推行湖南自治,并指出这可成为全国及“世界的大改造”的下手处。

张国基是较早前往新加坡的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5月23日,他在新加坡给毛泽东写信,除了告知南洋的一些情况外,主要是讨论新民学会会务。他的建议有六点:1.会务的进行。学会是专门为会友研究学问“和交换知识的一个新村,现在会友有在欧洲的,有在日本的,有在南洋的,分散到这样远,怎

样能够研究学问交换知识呢？我的意思，要发行一种书报，替我们做个意见的传达员”。2.会友的增加。吸收会员“要十分郑重”，“纵少要有四人以上的介绍，并且要得委员长和评议部的同意。就是学问性情，亦须有一个月以上的考察。若不是这样办法，就会弄得乱七八糟，牛溲马勃，都可收罗，不算什么学会了”。3.会友的界限。要“打破一切界限，无论男，女，老，幼，本省，外省，大学生，小学生，只要他的脑经[筋]受了这汪洋澎湃的新潮洗过，和宗旨相合，都是可以邀为会友的”。4.会内的设置。“应当找个一定的会所，多买书报杂志，以便会友的就阅，或借阅”，并有专人负责。5.经费的救济。“要于常年捐外，开一次特别捐，作为开办费，就是出版的书报，各人都要拿钱来买。”6.印刷会员录。“须将现有的会员姓名，别甫，籍贯，住所，通讯处，印成小册，以便常通声气。”<sup>[1]105-106</sup>

9月19日，张国基再次致信毛泽东。他首先赞扬道：“驱张的运动，达到了目的，湘民尚存有一线生机，这是你们的功德，我不歌颂。我只羡慕你们的精神战胜了武力。”接着，他谈到南洋通信社成立之事：“此间因涂九衢君不愿湘人南来，所以通信社事，没人过问。今年南来湘人，将近三十(另有名单)，已引起江浙人注意。”“我现在想邀合几个同志，把这通信社即行成立，以便后来的人，有所接洽。”<sup>[1]107</sup>为方便印刷会员录，张国基在信后特别附上了“湘人在南洋者一览表”。

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张国基，谈了“会务问题”“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及“南洋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sup>[1]110</sup>

毛泽东称张国基所言会务六项，他大体均赞成，并写道：“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关于“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毛泽东说：“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毛泽东还说：“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

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sup>[1]110-111</sup>

接着，毛泽东对湘人去往南洋提出了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sup>[1]111</sup>

毛泽东与张国基的相互通信，在第二集的书信中较为重要。首先，这些书信反映出新民学会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设有评议部，而评议部对吸收新会员“十分郑重”，只有纯洁、诚恳、向上的人，才符合入会条件。其次，这些书信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政治思考：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追求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世界大同。他把南洋各民族的自决与建国，视为促进大同的条件，这可能是受了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影响。可见，毛泽东之后带领多数新民学会会员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其思想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1920年5月25日，罗学瓚给毛泽东、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人写信，谈了他到法国后的感受。他

感觉法国“绝不见官场的势力”，“他们国内的官，都是服役的性质，决不敢对人民为恶；就是为恶的，人民也决不能容忍他”；“法国的兵，也不象中国专做官僚武人的死奴隶，他们有时虽被强迫派到各地去弹压罢工之事，但他们不干涉工人，并向工人说好话”。他感叹道：“可怜中国这些官僚武人，到一处就为一处的害，就霸占一处，杀人放火，由他横闹，骂是骂不死的，赶是赶不走的，这种厚面孔、居心狠毒的人，真是中国的特产。”关于留法会友与长沙会友的通信，罗学瓚说自己与李和笙、张芝圃、李富春等人商议，“想组织一合同通信社”。“张李诸君，初到此地，即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即以新民学会诸友及新来之同志所组合者，将来即以会内诸人为通信员。每人担任一月通信一次。在此地公举一人为总经理，在长沙即以文化书社为总收集处。”<sup>[1]113、114</sup>罗学瓚所说的法国“绝不见官场的势力”，给毛泽东研究中外政治文明提供了参照。而他提到的“想组织一合同通信社”“以文化书社为总收集处”，则表明长沙是新民学会的基地所在。

7月14日，罗学瓚又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谈到了“身体的大问题”、思想上的“四种迷”、工学励进会与通信社问题以及婚姻问题。

罗学瓚先是报告了7月蒙达尔纪会议的情况：“会员到的也有十三个之多，要算是新民学会成立后的一个盛会。”会议讨论了人生问题、家庭问题，“但还有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没有讨论，就是各人的身体问题”。在法的会员多数身体不好，不能工作。“中国读书人，一味注意读书，每每以身殉学，这种毛病，真可叹息。”<sup>[1]115-116</sup>

继之，罗学瓚谈到中国人求学的的方法有错误。他说：“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可叫做‘感情迷’”。“第二宗错误，就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那一部分推断全体”，“这可叫做‘部分迷’”。“第三宗错误，就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象这类的观察，可叫做‘一时迷’”。“第四宗错误，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

切”；“象这类的考察，可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这四种迷惑，无论何人，总有舍不掉的。连我自己，也免不掉的。这真是思想界混乱的原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大多数还是没有科学的头脑。”<sup>[1]116-117</sup>

接着，罗学瓚谈到在法国组织工学励进会一事，该组织“以新民学会的人为多”。关于组织通信社，他提到“由会内推一人主持信稿，各会员每月担任写信一封，或寄稿一篇，材料由各人自择”。“现在法信稿，由我征集，我拟一概寄至长沙，由你处置”，“不过要寄一份或两份报来”。他还说：“你前回写给予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sup>[1]117-118</sup>

罗学瓚还谈到了毛泽东等人当时主张的废除婚姻一事。他认为“要改革社会，非先改革家庭不可，欲改革家庭，非先改革婚姻制不可”。他劝毛泽东对“婚事万分慎重”，并说“将来也想到俄国去游一游，我们就相期在俄国会面好了”。<sup>[1]118-119</sup>

11月26日，毛泽东复信罗学瓚，称他“所论各节，透澈之至”。关于身体问题，毛泽东说“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没有按照“卫生的法则”来科学用脑。“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sup>[1]119-120</sup>

毛泽东称赞了罗学瓚关于“四种迷”的说法，并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四种迷，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sup>[1]120</sup>

之后，毛泽东要罗学瓚把“工学励进会”改为“工学世界社”的详情告知他，并要他陆续将通信稿寄到长沙文化书社。

在此信的最后,毛泽东抨击了旧的婚姻制度。他说:反对旧婚姻制度的人有好多,“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实践‘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sup>[11]121</sup>

从毛泽东的这封回信来看,他与罗学瓚交谊不浅,在学术上也有共同的见解。

第二集中其他会员的书信,主要是谈一些具体事宜。例如,1920年3月28日熊季光给陶毅的信,谈外国语言学习。4月21日罗宗翰给周世钊的信,谈升学问题。6月7日向警予给陶毅、任培道的信,主要谈女子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及女同志联络问题。6月22日萧子暉在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提及其兄“子昇在法,受气不少,而进步殊多。和森在校,完全自修,法文可看报,生字不多了”。<sup>[11]97</sup>7月11日萧子暉致信陶毅,报告自己已到法国,并介绍了在法会友的生活状况。7月25日萧子昇致信熊楚雄,称“会务万难”,并谈到在法国作工与阅读法文书报等琐事。<sup>[11]102-103</sup>9月15日刘明俨致信毛泽东,抱怨到法国后自己“是瞎子,又是聋子”,“不过每天吃了几块面包”。<sup>[11]100</sup>10月17日沈均致信毛泽东,说自己得到杜威、罗素等人将到湖南讲学的消息,而自己却在汉口求学,深感遗憾,并盼望学会的会报能早些寄到。

毛泽东没有忽略上述这些书信,将它们都收入《会员通信集》中。他收到萧子暉的信后很快复信,提到“仅仅常识是靠不住”,建议萧子暉在法国“研究一门学问”并将其“研究透彻”。毛泽东还委托萧子暉收集信稿:“学会出版物分‘通信集’与‘会务报告’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请设法收集在法诸友间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五集材料。”<sup>[11]94</sup>

1920年8月19日李思安在上海给毛泽东写信,问及《湘江评论》的出版情况,希望毛泽东“快些做几

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sup>[11]104</sup>毛泽东在11月25日给李思安回信,强调“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sup>[11]104-105</sup>

从总体上看,第二集收录的30封书信中,最为重要的有4封。它们是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这一天之内写成的。1.在回复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谈及湖南自治主张无望实现,决定“顿湘两年”,从事教育以“另辟道路”。这表明此时毛泽东还未转向用革命方法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2.在回复欧阳泽的信中,毛泽东强调新民学会是“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潜在的态度”之上。3.在回复罗璪阶的信中,毛泽东强调新民学会是“主义的结合”,主张湖南自治可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大改造”的下手处。这说明毛泽东对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尚在摸索之中。4.在回复张国基的信中,毛泽东主张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并把南洋各民族的自决与建国视为促进大同的条件。这表明毛泽东接触过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此时毛泽东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正处于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前夕。此外,毛泽东在易礼容信后的按语也很重要。他对新民学会的长远发展目标有着清晰的表述,指出改造中国的基础是组织共产党。但从毛泽东强调在湖南自治运动中“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来看,当时的他对怎样组织共产党还没有实际的方案。

### 三、“改造中国与世界”,成立中国共产党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收录了毛泽东与蔡林彬等会友的7封通信,起讫时间为1920年5月至1921年1月。与前两集相比,第三集收录的书信数量最少,而内容则最为重要,字数也较多。

第三集最前面除了有告知各会友信稿由长沙文

化书社转交的启事外,还有一则《新民学会紧要启事》。该启事强调“本会同入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对于本会无感情者”,“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sup>[11]23</sup>这表明,作为学会评议员的毛泽东,十分注重学会整体上的纯洁性,认为不能让无法保持学会精神的人留在会内。

在两则启事之后,毛泽东对第三集作了极简要的介绍:“这一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sup>[11]23-124</sup>

第三集收录的首封书信是蔡林彬于1920年5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对于此信,毛泽东提炼的要点是:“研究社会主义”,“希望实现小学计划,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合居等”,“我们须于文化运动更进一步”。

此时,蔡林彬正在关注与研究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及各种党派。他在信中说:“近正汇译德国政变与其社会,共产,工团,各党消息寄你,起自社会民主党之分裂,以迄此届选举终结,故须等至六月中旬始能告竣(德国此次选举期为六月六日)。”“我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蔡林彬还谈及新民学会的计划与发展:“兄留湘两年,极为重要。”“两年之中,会友能办到百人教书,最好没有。”“新民学会尽其可能扩大,同时尽其可能严格,这是我的总意思。”<sup>[11]25,127</sup>毛泽东发布《新民学会紧要启事》,告勉会友保持学会的精神并进一步严格新会员入会条件,应与蔡林彬的建议有关。

8月13日,蔡林彬再次致信毛泽东,要点为“社会主义讨论”和“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说自己“拟编译一种传播运动的丛书”,涵盖四个方面:

“(一)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分四种形势:1.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俄。2.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小产地方——中欧及巴尔干战败诸国。3.阶

级革命酝酿的地方——五大强战胜诸国。4.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塞维克上去的地方——诸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

“(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1.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2.工团。先的作用为实力的革命军,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后的作用为生产组织。3.合作社。先的作用为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消贸易主义,为消费组织。4.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

“(三)世界革命之联络与方法。1.万国共产党(本部在俄)之计划与方法及新旧国际党之经过。2.万国工会组织,作用,最近之举动。3.万国同盟罢工(如最近万国矿工会宣布如协约对俄再战则下令英法矿工罢工)。4.万国同盟结[绝]交(如今年六月万国工会宣布与虐杀工人及社会党之匈牙利反动政府同盟绝交,电邮路船,都不与通,结果被捕之人民委员得减死刑)。

“(四)俄罗斯革命后之详情。”<sup>[11]28-129</sup>

蔡林彬还说:“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我认为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sup>[11]29</sup>他以俄国革命为证:“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sup>[11]30</sup>

蔡林彬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 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我以为要邀一些同志跑到资本家的工厂里去,跑到全国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去。去干甚么?去做工,办事,当代表,做议员。我望你物色如殷柏者百人,分布全国各处,不必他往,亦不必另组机关,即以中产阶级现

成的职业机关,议会机关,做革命机关。这种方法,我得之于布尔塞维克。二月革命后,布党遍布全国各机关,列宁亦人[入]了克伦斯基政府,所以十月革命一举成功。”<sup>[11]30,131</sup>上述言论表明,蔡林彬希望效仿列宁的做法,通过内部突破来取得革命成功。

蔡林彬还设想“将来以俄为大本营”,派人“长驻工作”。他告诉毛泽东:“木斯哥万国共产党”“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sup>[11]31</sup>“我意我们的运动成熟,必与俄国打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sup>[11]32</sup>

蔡林彬简要介绍了世界革命运动大势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形,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四种利器”,强调要组织共产党并“以俄为大本营”,在中国实行俄式革命。这些观点对毛泽东之后的道路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

七八月间,萧子昇也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写了以下提要:“子昇这信,报告赴法会友在蒙达尔尼(纪)开会情形,并发表对于同志进行及会务发展的意见,颇关重要,是会友人人应该注意的。”<sup>[11]33</sup>

萧子昇首先说:“‘结伴游俄’最赞成。顿湘两年,必要。”他建议毛泽东归湘后要做什么事:“(一)你自己读书(与好友同行)。(二)整理会务(确定规模,立稳基础)。(三)仍一面教学生——不必限定教小学生。(四)仍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立于舆论的地位为宜。”<sup>[11]34</sup>

接着,萧子昇介绍了在法会友开会的情况,谈到了蔡林彬与自己的不同观点。在述及“会务进行”时,他写道:

“(一)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故于中国与世界之改造方法,极力讨论。先说主张: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

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缓和。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赞周谓现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较难。外和笙,子暉诸人亦多讨论。

“(二)会务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如有同志活动之必要时,可新组一会,以新民会员全数加入亦可。不可以学会为牺牲,一时东扯西拉,凑集一些目的不相同之人。

“(三)会章修改,本为必要,但此系具文,可从缓议。

“(四)出印刷物,尽力所及,切实作出报告亦可。若月出一册,现在力量——人才,经济——或者不够。

“(五)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尽可立即直阅法文书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sup>[11]37-138</sup>

萧子昇对会务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主张力学、力行。“力行之事,最宜注意者两义:(一)改造世界与改造中国是一件事,宜同时并进。(二)因此改造中国,不可忘却世界,要戴改造世界的眼镜去改造中国。力学之必要:(一)我们常识尚不充足。(二)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三)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sup>[11]41</sup>他还估量了学会的优点与缺点,认为会员“宜极力猛省,觉悟,进步”。<sup>[11]42</sup>

在述及个人求学计划时,萧子昇说自己年龄太大、境遇太苦、根底太浅,“虽不做大学问家,却愿做个大常识家”,“主张与世界各地同志联络进行,互助互益——如今之万国某某党——我便喜欢去做此事”。他打算学法文、英文,研究社会学,并“仍以教育事业为中枢”。<sup>[11]42</sup>

同年8月28日,李维汉也给毛泽东写信。对于此信,毛泽东总结的要点是“不赞成俄式革命”。李维汉说:“团体的组织,我觉得要建筑于多方面的同情,换言之,就是要先都有了某种要求,然后借组织的力量去产生之。若是专靠组织去鼓荡出共同的要求,还嫌勉强,怕不彻底。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

有未敢赞同之处,但也不反对人家赞成他,或竟取法他,说来很长,且待研究。”<sup>[1]143-144</sup>

毛泽东在1920年11月收到上述这些信件后,于12月1日给萧子昇、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回了一封信。他给自己的这封回信也标出了要点:“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赞成马克思式的革命”;“学会的态度:(一)潜在,(二)不依赖旧势力”;“会员的态度:(一)互助互勉,(二)诚恳,(三)光明,(四)向上”;“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学会的四种运动”;“联络同志之重要”。<sup>[1]144</sup>

在信中,毛泽东从六个方面具体展开说明。

一是学会方针问题。毛泽东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sup>[1]146</sup>

二是方法问题。在谈到“到底用甚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时,毛泽东评论了蔡林彬、萧子昇、李维汉的观点。他赞成蔡林彬的意见,即“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不赞成萧子昇、李维汉的方法。他说:“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sup>①</sup>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

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sup>[1]147-148</sup>“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sup>[1]149</sup>“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sup>[1]149-150</sup>

三是态度问题。毛泽东认为,态度分为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学会的态度是“潜在”,“算可以确定了”。此外还有“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

(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sup>[11]150-151</sup>

四是求学问题。毛泽东表示：“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子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sup>[11]151</sup>

五是会务进行问题。毛泽东说：“子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而“纯粹预备时期”要延长五年“至民国三十年”。他还说：“子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掣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现在文化书社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sup>[11]151-152</sup>

六是同志联络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sup>[11]152</sup>

毛泽东的上述阐述，表明他吸纳了蔡林彬和萧子昇的不少重要意见。对于蔡林彬主张“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表示“深切的赞同”。对于萧子昇提出的求学方法，他认为“诚哉不错”，并强调“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这句话正是毛泽东一生的写照。他的一生既是从事社会实践、改造世界的一生，又是从事理论研究、开拓创新的一生。

9月16日，蔡林彬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题

是“共产党之重要讨论”。<sup>[11]153</sup>在这封信中，蔡林彬从唯物史观出发，再次阐述了自己为何“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他说：“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惟理派相反，故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惟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总之人由低等动物进化成的。道德根于先天之说不能成立，成立也无意思。人是一它物质。人是一个消费(吃，穿，住)才能活动的动物。故人的理想云为乃是吃了饱了之后的物质的化分(或派生)。我以这种直捷简单的理由，肯定唯物观否定惟理观。惟理观弊病到了化境(助长有产阶级)，唯物观才由马克思寻找出来。这真是思想史上一桩大喜事！修正派改良派(即染了有产阶级惟理主义的毒)的考茨基，伯伦斯丁等，好胆大又把中产阶级的惟理主义拿来驳唯物史观，以为‘人’‘社会’决不是单由物质的条件决定的，还有内心的理想的支配力。唉！这真是为资本家说法。结果是以唯物史观启发阶级战争的动机为卑下为薄弱(现张东孙<sup>①</sup>也是这样说)，而别寻所谓高尚的动机，及寻一劳资调和的办法，故他们最终的结果，主张改良而不主张革命。”<sup>[11]153-154</sup>蔡林彬的论述较为简单，也不是很准确，但把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明确区分开来了。他由此出发，对比了“俄德革命之不同”，并列出了下列公式：

“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

“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言时)，取消国家。

“德多数社会党立足于=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

“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利用革命与中产阶级联盟组织政府。

“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

“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内乱,破产,反革命,压迫工人,闹个不休。”<sup>[1]154</sup>

蔡林彬批评张君勱“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见解放与改造)。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很足误人”。蔡林彬强调:“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原来阶级战争就是政治战争,因为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才能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换言之就是要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sup>[1]154-155</sup>

蔡林彬再次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布尔塞维克,既已把俄罗斯完全彻底的建设其主义,于一九一八年改名共产党。与德李伯克奈希,罗森堡,所手创的斯巴达加斯团(不久亦改名共产党),及匈贝拉康所组的共产党,组织‘第三国际党’(即万国共产党),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正资本家分赃会议在巴黎热闹时),在莫斯科成立,加入的团体共三十五个。”<sup>[1]156</sup>而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极严”:“1.改名为共产党,以后一切宣传运动皆为共产党性质。2.排除右翼的改良派,爱国派,中立派,入阁派的首领,然后才准加入。”<sup>[1]157-158</sup>

此外,蔡林彬还详细地介绍了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条件和该党的基本情况:“(1)二人介绍于地方支部。(2)入党的实习所受训练三月,作为后补入党之期。(3)实习所的指导员一步一步引导他们到共产主义的生活上来,并令他到共产主义的学校去听讲。(4)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5)如指导员训练未成熟,须再受训练三月。(6)然后具愿书三份,须守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份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现全俄政府每部的事纵多不过十余人担任,全国劳动联合总会五人担任)。党的最高机关为中央

委员会。党中设宣传运动部,组织教育部,调查统计部,义务劳动部(此部专为党员做星期下午的义务劳动,以为社会倡率而设)。”<sup>[1]159-160</sup>

蔡林彬认为十月革命“完全是一种组织的革命,绝不是流血的革命”,并提出“革命的标准在客观而不在主观”,“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现制度不能解决他,那末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蔡林彬建议仿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步骤”,“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sup>[1]161</sup>

在信的最后,他将自己的意见稍作综合:“我以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不懂的人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宁及万国共产党已再三宣言,专政是由资本主义变到共产主义过渡时代一个必不可少的办法。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世界组织完成了,阶级没有了,于是政权与国家一律取消。”<sup>[1]161-162</sup>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他强调:“我以为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办法,舍此无方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怎样去组织共产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推迟革命,因为“迟一点儿资本家的大战又起了,伏尸流血又不知几千万,而战死与破产及生活昂贵的大祸,都是无产阶级受了”。<sup>[1]162</sup>

蔡林彬的这封信是1920年底由萧子昇回国后转交给毛泽东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强调,“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并表示自己“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他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sup>[1]162,163</sup>

总而言之,第三集的内容表明,新民学会内部出现了明显分化。对于如何改造中国社会,总干事萧子昇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的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主张实行温和的革命即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而作为学会实际领导人的毛泽东与蔡林彬等倾向于在中国推动俄式革命，但不是立即进行暴力革命。此时，毛泽东与陈独秀有直接联系，他带领在长沙活动的会友，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长沙成为除北京、上海等地之外的又一个早期党组织活动中心。

#### 四、结语

毛泽东带领国内的新民学会会员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而蔡林彬则在法国领导留法会员，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三集中蔡林彬与毛泽东的5封通信，表明毛泽东与蔡林彬思想一致，两人都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蔡林彬的特殊贡献是，在法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除日本、苏俄之外的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源头。蔡林彬自1919年12月下旬起程赴法国，次年2月上旬抵达巴黎，1921年10月中旬被遣送回国。他在法国虽然只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但他只俭学而不勤工，努力学习法语，在短时间内收集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法文书报，猛看猛译，夜以继日，很快就把世界大势特别是欧洲形势、俄国革命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各个派别基本上弄清楚了。蔡林彬以自学得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影响了众多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让他们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学说，接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主张。

1920年7月8日至9日，蔡林彬等在蒙达尔纪会议上讨论求学方法，提出在法会员应“返谋合居共学，预备译书译报”，一面练习文字，一面获取新知。<sup>[2]63</sup>由他们汇集而来的大量理论信息，经过蔡林彬的提炼，以通信的方式传送至在长沙的毛泽东手中。而由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而来的工学世界社，在蔡林彬的影响和帮助下，逐渐克服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该组织的多数成员都积极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

由于蔡林彬等新民学会在法会员的积极作为，陈独秀对留法学生寄予厚望。1920年7月底，陈独秀与张国焘讨论建党问题，表示“很赏识毛泽东的才

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sup>[3]98</sup>蔡林彬在法期间，曾致信陈独秀，阐明自己的革命理念。他称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并提出了革命的三个步骤：“我们无产阶级社会党，应亟于各大都会组织同阶级之失业者，最下层的贫困无告者，第一步公然起来向政府论南北要求‘生存权’和‘劳动权’”，“第二步要求监督实业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产业及政治管理权”。“上列三个具体步骤，为中国社会运动，社会改造的不二法门。”<sup>[4]77-78</sup>陈独秀收到蔡林彬的信后，于1921年8月1日回信指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观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sup>[5]157</sup>这可视为对蔡林彬提出的“三个具体步骤”的认同和进一步提炼。显然，蔡林彬关于建党和革命的看法，对陈独秀和毛泽东都产生过影响。而他在法国亦确实在着手建党，可惜未最终完成。1921年12月蔡林彬回国后，很快就被陈独秀委以重任，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后来在党的二大上，蔡林彬以留法中共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而在蔡林彬归国之前的1921年10月，毛泽东已在长沙建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为委员。这是全国最早的省级支部。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友间的通信，展现了新民学会的演化历程。众多会友从追求个人的纯洁、诚恳、向上，共同信守“主义的结合”，发展到追求改造中国与世界，总体目标是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实现世界大同。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毛泽东、蔡林彬等带领一批会友向共产主义者转变，成为中国第一代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毛泽东等人于1920年八九月间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传

播新文化,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研究俄国革命,进而建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毛泽东、蔡林彬的主持、带领和影响下,数十名新民学会会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有何叔衡、向警予、蔡畅、杨开慧、谢觉哉、李维汉、罗淑阶、易礼容、郭亮、夏曦、萧三等。1921年夏,随着毛泽东与何叔衡代表湖南共产党组织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新民学会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豹变的新民学会会友踏上了新的征程。

通过深入研究《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我们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新民学会这一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具有重要地位的进步团体,亦可以更好地了解青年毛泽东的卓越组织领导能力、探索真理的执着态度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崇高理想追求。可以说,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实践,与新民学会是同步的,毛泽东不愧为新民学会的精神领袖。他留下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珍贵材料,亦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续发扬毛泽东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精神,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注释:

①蔡林彬即蔡和森。蔡和森,字润寰,本名为蔡林和森,“蔡林”为复姓。1913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时,蔡和森以“蔡林彬”为名报考,后沿用此名。同时他也以“蔡和森”为名。新民学会会员互相通信时,多称字面不称名。如其他人致信毛泽东时,往往用“润之”来称呼他。但对蔡和森,会员多直接称其为蔡林彬。本文在提到他时,主要用“蔡

林彬”之名。由于一一说明较烦杂,本文对新民学会会员称呼不作详注。

②罗荣熙即罗学瓚,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

③此信标题为《蔡林彬给萧旭东》。萧旭东即萧子昇,旭东是他的字,后来他还曾改名为萧瑜。新民学会会员在通信中既有称他“旭东”的,亦有称他“子昇”或“子升”的。

④蔡林彬说“此二人亦不审其果有价值否”,表明他对茅原华山的了解也不多。茅原华山(1870-1952)本名茅原廉太郎,东京人。1892年后,担任以《万朝报》(东京著名进步刊物)为首的几家报社的评论记者。他曾提倡激进的民本主义,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制,后又转向了代议政治无用论。1916年后,“随着逐渐远离民主主义潮流,他的中国论也演变成了典型的蔑视论”。他说:“没有道义精神的民族无疑是堕落的民族。而堕落的民族也无疑是不洁不净的民族……支那民族是最伪善的民族……满身是利,利的权化即是支那民族。”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为何不称霸支那”。参见[日]石川祯浩:《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⑤彭璜,字殷柏,亦作萌柏。

⑥罗淑阶即罗章龙。

⑦原文如此,此处的“升”应为“昇”。

⑧原文如此,此处的“惟”应为“唯”。

⑨应为张东荪。

#### 参考文献:

[1]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李永春,编著.蔡和森年谱[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4]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陈独秀文章选编(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